

人文社會科學叢書

近代中國 對外關係新論 —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

石之瑜 著

國立編譯館 主編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



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

——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

石之瑜 著

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



國立編譯館 主編

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

近代中國對外關係新論

——政治文化與心理分析

作 者 / 石 之 瑜

責任編輯 / 林 慶 輝

校 對 者 / 林 慶 輝

主 編 者 / 國立編譯館

著作財產權人 / 國立編譯館

出 版 者 /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

地 址：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

電 話：7055066（代表號）

傳 真：7066100

劃 撥：0106895-3

局版臺業字第 0598 號

發 行 人 / 楊 榮 川

排 版 / 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製 版 / 和鑫照相製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/ 東陞美術印刷有限公司

裝 訂 / 信成裝訂行

中華民國 84 年 12 月初版一刷

ISBN 957-11-1092-2

定價 280 元

人民幣：119.05元

（如有缺頁或倒裝，本公司負責換新）

序

言

本書係作者重新詮釋中國外交史嘗試的開端，一方面修正因西方社會科學以物質的、競爭的觀點，所造成對中國外交行為的認識偏差，另一方面也試圖用社會科學界所能容許的語言，傳輸以中國為主體的分析史觀。書中引用了機械意涵濃厚的御控學（Cybernetics）為基本語言架構，但是卻是以中國外交決策者的個人文化心理動機，來作為每一次外交御控過程的發動者，故又有解構此一機械概念的作用。總而言之，作者希望透過本書，協助國內學術界能用西方的語言，反駁西方的誤導，並強化對於西方現實主義偏見的免疫能力。

本書得以完成最大的功臣，是作者父母多年來的協助；其次是研究助理張登及學弟，不厭其煩地將英文資料轉譯成中文。本書是將作者多本英文著作的內容加以汲取刪增，再經整理修訂後完成，登及兩年來的協助，功不可沒。後來加入此一工作的又有念慈、貞觀、修瑋和淑燕，他們都聰慧靈犀，耐苦耐勞。我們邊作邊學，常有新的體會，這是不可言傳的收穫。

目 錄

第 1 章 近代中國外交的社會科學研究

一、一般文獻整理	1
二、文化性分析	5
三、對知識領域之貢獻	9

第 2 章 外交分析之文化心理御控模式

一、文化與外交	17
二、御控學簡介	21
三、心理御控學簡介	25
四、文化心理御控簡介	28
五、國家文化心理御控	32
六、外交政策	37
七、適用問題	42
八、結 論	48

第 3 章 中國人文化心理下的外交動機

一、不平等關係的規範	61
------------	----

二、不平等規範的維持	64
三、平等關係的規範	66
四、平等規範的維持	68
五、反抗行為的規範	72
六、自我修持	77
七、馬克思主義	79
八、文化心理與外交	85

第 4 章 面子外交與國家角色

一、領導風格	98
二、中國外交史上的領導人物及其領導風格	101
三、結 論	138

第 5 章 一百五十年來國家形象的變遷

一、鴉片戰爭以來的清末外交	149
二、民國時期的外交	159
三、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的外交史	164
四、結 論	182

第 6 章 近代中國外交行政的組織行為

一、組織的概念	190
二、制度特質	193
三、外交風格	206

第 7 章 當代國際政治學中的戰爭迷思

一、國際政治中的心理安全問題	223
二、國家自我形象與外交政策行為	224
三、政治家、形象概念與政治	226
四、國際政治中的武力使用	228
五、情報、實力以及象徵性的戰爭	230
六、中國的例子	231
七、方法論	232

第 8 章 清末民初時期的軍事、外交案例

一、鴉片戰爭	239
二、修約戰爭	249
三、中法戰爭	251
四、中日甲午之戰	253
五、八國聯軍	255
六、抗 戰	257

第 9 章 韓戰與中共早期國家角色定位

一、前 言	271
二、背景與戰爭	278
三、後 續	290
四、分 析	291

第10章 金門危機與中共自我定位變遷

一、背 景	301
二、砲戰期間	304
三、分 析	306

第11章 中印邊界戰爭與國家定位危機

一、背 景	313
二、戰 爭	317
三、後 續	319
四、分 析	320

第12章 珍寶島戰役中的世界革命形象

一、背 景	325
二、衝 突	330
三、後 續	332
四、分 析	333

第 13 章 德越戰爭與中共對現狀的接受

一、背 景	341
二、戰事的進行	347
三、後 續	348
四、分 析	349

第 14 章 結論：中國人的面子外交心理

一、面子外交	355
二、中國外交	357

近代中國外交的社會科學研究

西方關於中國近代外交的理論性著述不多，大部分社會科學性質的分析，都集中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共對外關係。這個時間上的分野，給予人們一種印象，即在四九年之前與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對外關係行爲，是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。本書則將中國人對外交往的心態與立場，作一個歷史回溯，進而辯稱自一八四〇年代迄今之中國人外交模式，存在著可循的文化軌跡，在這個軌跡之上，中國人外交行爲背後的心理動機與其外在表現，都表現出一些特色，當代西方學術界關於中共外交行爲的描述，迄未深刻地掌握住其中之精髓。在本書正式建構分析中國人對外關係行爲模式之前，不妨先簡述一下西方學術界處理過的一些理論觀點。

一、一般文獻整理

(一)危機背景結構之分析

葛托夫與黃氏（Gurtov and Hwang）認為，中共每次動用武力，都發生在內部政治危機與外來威脅增加之際，韓戰即爲一明

顯的例子。^①中共的參戰是在內、外壓力之下所致。內在壓力即革命成功的初期，反對勢力仍強，國軍不時伺機反攻；外在壓力主要來自美國麥克阿瑟將軍的攻擊性戰略，美軍不僅超過三十八度線，且揮軍北上直逼鴨綠江。此外，第七艦隊的巡弋臺海，及美國經援印支法軍，亦是原因。

五八年之臺海危機時，內在危機乃因生產大躍進與狂飆的公社運動所造成；外在危機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敵對態度，他揚言支持盟邦推翻共黨政權，另有中華民國的積極策劃反攻。六二年與印度之衝突也不例外，內在危機是毛澤東與劉、鄧集團進行大躍進失敗後，再一次的路線鬥爭；外在危機則包括美、華聯合籌劃反攻，美、蘇簽訂禁止核試協議之消息於六二年八月傳抵北京，引起超強聯合對抗中共的恐懼，以及印、蘇關係日密等跡象。

六九年珍寶島事件是在文革大亂之中，對蘇聯入侵捷克所帶來的慌亂與恐懼的過度反應。七九年之「懲越」戰爭發生於大門四人幫餘黨，及發動四個現代化運動的關鍵時刻，適逢越南在蘇聯支援下，推動印支聯邦計劃。總而言之，中共對於外來勢力與內部反對派系勾結之可能性，極度敏感，故每有內部動亂，則對國外之風吹草動，過度反應，鋌而走險。

(二) 官僚鬥爭結構之分析

許多學者認為，派系之間的權力均衡常影響對外決策的最後制定。比如說，李侃如（Lieberthal）發現自清末以來，中國政界就存在三種勢力：自力更生派、全盤西化派與中體西用派。三派

皆把國內的發展優先順序與外交政策相提並論。這三派中，誰佔優勢，誰就主宰外交政策的發言權。^②

高特列伯（Gottlieb）也提出他的三派主張，即激進派、軍方和溫和派。這種分法與李侃如早先另外提出的三派相符，即激進派、保守溫和派與溫和派。前兩派自六〇年代初期即反美甚力，但後兩者則聯手抵制文革。他們彼此之間的折衝應對珍寶島事件負責。^③布朗（Brown）認為，此事件乃溫和派與毛澤東共同策劃，以爭取內部反蘇親美的勢力。^④李侃如卻認為，也有可能事件是軍方故意觸發，以加強其在政治圈中的地位。高佛（Garver）更認為，溫和派在七〇年代鬥倒軍方，成為「中」美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最大功臣。^⑤

（三）政治經濟結構之分析

施樂伯（Scalapino）主張，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，與歷史上鬥爭經驗的迥異，造成中、蘇共之間發展策略的差別與整體利益之衝突。^⑥范乃思（Van Ness）和肯明斯（Cummings）都認為，發展策略的差別，將反映於對外策略與聯盟關係中。^⑦中共在五八年之前採用統治型經濟，與蘇聯聯盟；五八年後專講自力更生，對外則呈現孤立，並同時與兩超強對抗；至七〇年代，發展市場型社會主義時，則與美國進行關係正常化。統治型經濟下的中共與美國打了韓戰；自力更生的中共則與美國在臺海對峙，更與蘇聯大戰於珍寶島；市場型經濟下的中共，最終和蘇聯支持的越南大打出手。

(四) 國力結構之分析

派金斯 (Perkins) 研究中共的外交政策，首重其過去在經濟發展上的表現。首先，派氏認為中共農業養活老百姓的能力，與大陸人民要求輸入食品的壓力成反比，但進口食品要仰賴出口以增加外匯，所以必須開放貿易。第二，民生物資與國防物資在生產分配上的矛盾，直接影響到中共與兩強對抗的能力與意願。^⑧

諾斯 (North) 進一步強調，任何國家在國際上所能扮演的角色，其決定的第一因素即為能力。可惜他在分析中共危機行為時，與歷史學家採用陳述的途徑無異，使讀者難以體會能力的重要性。事實上，他認為中共的激進行為，肇因於它力圖重建中國舊帝國時期的歷史疆域。^⑨

(五) 國際體系結構的分析

恩昆 (Ng-Quinn) 認為中共的外交政策十分現實。他認為了解中共外交政策之首要因素，毋須在其內部找尋，了解國際結構才是首先要著。恩昆認為現行國際結構為兩極，中共的力量尚不足在美、蘇兩強之外形成第三極，但是它的力量足以使它可以在兩強之間作選擇，而不受任何一強的嚴密控制。在內戰期間，中共本擬向美國要求合作支持，在被拒絕後一面倒向蘇聯。中、蘇共間小衝突不斷，而中共與蘇聯公開決裂，乃係六二年爆發中共與印度戰爭以後之事。即至六五年美軍在越展開新行動，使中共又向蘇聯靠攏。然而六六年發生文化大革命及六八年捷克事件，又使兩邊鬧僵，甚至昇高到在珍寶島兵戎相見。大戰之下，中共

選擇向美靠攏。^⑩

這種從國際兩極結構了解中共危機行為的說法，早已耳熟能詳。依此說法，危機並不會改變中共的國際地位，充其量只是影響它在兩強之間作選擇的條件。所謂危機的可能功能有二：強化現行聯盟，或改變現行聯盟。不過，恩昆承認，在六二年至六四年，以及六八年至六九年的兩個短期間，出現國際兩極結構無法解釋的現象，即中共同時與兩強對抗。他認為，只有這種例外情況才需要用其它結構來解釋。

二、文化性分析

目前對中共危機行為作主觀意識研究者，基本上可分為四類：一、為民族主義，二、為帝國主義，三、為意識型態，四、為歷史遺傳。大多數的作者都探討了歷史遺傳的影響，但他們彼此不同點，在於此一歷史遺留的傳統，對現今之危機行為是否仍有影響作用。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，以中共鄰近小國來美之學者探討較多，西方或華裔學者則較強調民族主義與意識型態的重要性。

（一）民族主義之研究

廖光生（Liao）與奧吉哈（Ojha）是研究民族主義與外交行為的代表。廖氏以為，民族主義的起源，乃是清末民初在外族欺凌下，所發展出來的仇外情緒。一九四九年之後，仇外情緒卻成了政客們御用的工具，仇外運動與羣衆運動在中國大陸密不可

分。廖氏發現，仇外運動和外部危機行為有絕對的關聯性。^⑪但他沒有提到外部危機引起仇外運動，還是仇外運動造成外部危機。

奧吉哈認為仇外情緒是中共危機行為中潛在的重要因素。中共之所以接納馬克思主義，乃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對西方現行制度在道德上的一種否定，因此間接滿足了中共仇恨西方的心理。台海危機是一種反美的表現，對印度戰爭也反映中共對大英帝國所留下之疆界的反感。從這個角度看，民族主義的體現，表現成對疆界之完整與獨立的控制，任何有損此一完整與獨立的象徵性行為，均將激起中共的強烈反應。^⑫美軍在一九五〇年越過朝鮮半島的三十八度線，和俄軍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，都造成中共強烈的反應，乃此一獨立與完整地控制疆界的感覺，受到象徵性的挑戰所致。

(二)帝國主義之研究

亨特（Hunt）認為，中共對邊界紛爭之處理，反映出一種古老中國對待鄰國時，那種習慣性的控制慾。^⑬歷史上的優越性，種下了中共對外行為的帝國主義因素，這種因素明顯出現在韓戰、越戰、台海危機、珍寶島事件與中印戰爭中。

艾斗（Adel）將帝國主義之說推到極點。他認為中國歷史證明，中國人有一種向四方擴張侵略的慾望。他用秦朝征越來比喻七九年的「懲越」戰爭。根據艾斗的分析，中共對外侵略有一定的模式，首先在爭議區製造爭端，掀起戰爭預期心態，然後大舉移入牧牛或牧羊的人民，攻擊對方的巡邊軍隊，聲稱事端在中

共境內發生，然後進行所謂的「自衛性」還擊。^⑭

(三)意識型態之研究

意識型態與危機行為之關聯，主要由毛澤東思想來連繫。波萊克（Pollack）發現，中共的戰略觀是長期性與全球性的。當然短期內發生非預期變故之可能難以避免，但中共最後總能用它的那一套邏輯作成解釋。毛澤東把美國帝國主義當紙老虎。然而美軍在朝鮮半島介入韓戰，似又與紙老虎之說有所出入，惟中共則極力宣傳美軍被「擊敗」了。^⑮

毛澤東認為在戰略上要蔑視敵人，而且認為東風漸壓過西風，因此視赫魯雪夫的低邊政策為不可思議。台海危機揭露了他與赫的戰略觀迥異，他認為美帝不可能全力保台，中共本身更不可能受到美帝直接侵略，赫則似乎對毛澤東在台海的冒進憂心忡忡。一九六五年，美軍介入越戰，帝國主義衰退的預言似乎受到挑戰，但後來毛澤東解釋之為美帝垂死前最後的掙扎，則其對中共之威脅性自不可能太強，因而否決了遣兵入越之考慮。

鄒氏（Tsou）及哈普林（Halperin）詳論了毛澤東思想對中共危機行為之影響，他的敵進我退，敵退我進策略，似已證明能有效地在韓戰中擊敗敵人，在台海危機中避免危機的升高，在一九六二年緩和印度的軍事反擊。適時的撤退是毛澤東全球思想中，以鄉村包圍都市，爭取中、長期勝利，刻意忽視短期挫敗等邏輯的合理結果。此一邏輯並非緣自實力的增進，而是緣自帝國主義必敗的共產教條。^⑯

毛澤東思想也是行動的指南，鮑布羅（Bobrow）等人發現，

中共在危機發生前都已充分準備，危機中特別強調經濟因素，鞏固內部控制，^①對任何情報都作成好與壞兩面解釋。這些觀念造成中共危機行為中缺乏奇襲的因素。在採取軍事行動前，中共都進行廣泛的測試與發出接二連三的警告，軍事行動本身常向次要目標作決定性之打擊，絕對強調原則，不作任何基本妥協。

(四)歷史遺傳之研究

歷史遺傳的第一因素是儒家思想，中國是天下，君王是天子，外國人是夷人，夷夏之間由進貢制度來聯繫。曼科(Mancall)認為，這種階級性的世界觀，是毛澤東願意接受史達林領導的重要因素，蓋中國人傳統裏沒有平等相處的觀念，赫魯雪夫的低邊政策，因此是一種領導人不負責任的表現。^②

克蘭姆班(Cranmer-Byng)和曼科一樣，都主張中國人的政治，就是中國人的道德觀。國力是德性的發揮，政治是倫理的函數。^③所有中國人集團的領袖一成不變地相信，中國文化的偉大價值與生活型態，是世界人類道德的指針。蘇修悖離馬克思教條，無疑將被視為異端邪說。其實這只是中國人傳統上強調主觀力量的另一事例罷了，對馬克思教條內容的了解，遠不及對馬克思主義奉獻的精神來得重要。

這種強調主義，忽視客觀的思維邏輯，使布爾曼(Boorman)結論說，中國人的軍事策略永遠是強調控制敵人的心理狀態，他的自我形象，他的面子，他的個性等所謂攻心為上之信仰，這些全都是西方軍事家不相信的東西。^④